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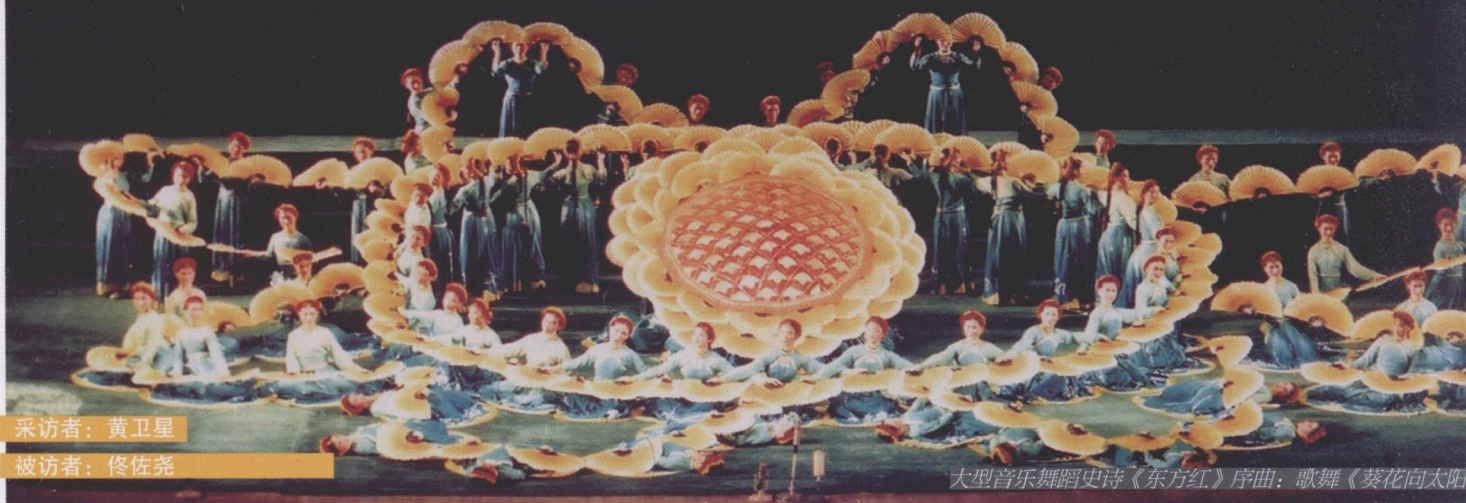
# 专题采访:

# 尊重艺术规律 *Respect* to art rhythm

——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编导专访系列之四

—— interview with choreographer of  
the dance drama "red oriental"

# 4



采访者: 黄卫星

被访者: 佟佐尧

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序曲: 歌舞《葵花向太阳》

被访者简介: 佟佐尧, 1935年出生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舞蹈编导之一, 大型歌舞剧《毛主席在安源》导演。曾任中央歌舞团舞蹈编导, 国家一级编导,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###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

黄卫星：您能简单介绍一下《东方红》的创作语境吗？

佟佐尧：那时候我们国家物资很匮乏，都是凭票供应，刚过了自然灾害，大家情绪都缓过来了，1964年正好赶上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，周总理提议说要弄个大歌舞。

我们八月初集中起来，九月开始彩排，就一个多月时间，《东方红》就全出来了。《东方红》创作主要有三个基础：一是历史歌曲；二是上海的《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》；三是朝鲜的大歌舞《三千里江山》。

编导们当年都特别年轻。那时我还是演员，也帮着编导金明工作，我就像他的徒弟一样，所以调金明到《东方红》工作的时候，把我也调去协助他。

黄卫星：您当时多大？

佟佐尧：28岁，我当时正在外地巡回演出，接到电话叫我赶紧回来，就这样进了《东方红》剧组。那时候刚刚结束自然灾害，很流行“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”，这是《自有后来人》里面的台词。

黄卫星：《东方红》创作组汇聚了全国的精英，一起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，来呈现一种历史记忆，可谓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。

佟佐尧：当时我们编导组有广东、济南、沈阳、上海等全国各地调来的。演员也是全国的，群众演员来自南京、沈阳、济南，当然主要还是北京的。

黄卫星：1964年文艺界已经开始了整风运动，《东方红》筹备阶段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很多艺术家，当时的创作有没有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？

佟佐尧：我们没有受到影响，但是我们的领导肯定感受到了。当时一腔热血搞创作，大家情绪热烈而紧张，根本不分你是哪场的哪组的，只要你有时间，就可

以来看我排的这场，这场定稿了，大家都高兴，明天接着排下一场。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创作中去，政治气氛也相对宽松许多。

### 总理倾注心血

黄卫星：大家刚一投入《东方红》的创作，很快就进入紧张的工作中了？

佟佐尧：那时候我年轻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不太知道这个事情的意义，大家也没有充分重视，当时有些主要团体也没有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进去，大家以为是搞个例行的国庆晚会。对《东方红》历史意义的认识和觉悟是慢慢形成的，并非一蹴而就。

人民大会堂架子搭起来后，第一场演出一下就轰动了，观众特别喜欢，接着到处搞专场，大学生专场、干部专场……毛主席看了以后，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，就在毛主席提出修改意见之后，大家才感觉到这个事情的意义特别重大。周总理说要拍成电影，那时候演员不够就从全国各大军区调。

黄卫星：我查阅了周恩来的年谱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周恩来对《东方红》的关心和指导超出了任何一部作品和文艺活动，他对《东方红》倾注的心血最多，《年谱》对《东方红》事件的相关记录有近十次。周总理一直非常关心文艺、文化的发展，以及文艺工作者。

佟佐尧：周总理经常来看我们排练，而且还不让人通知，后来大家都和周总理熟了，觉得来了就来了，都习以为常了。周总理来了就坐下去，就是很平常的小事，他都很关心。有时，周总理带着外宾来参观，他很骄傲地介绍《东方红》。周总理和文艺圈人士关系很好，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。他不仅关心文艺创作的广度，还关心深度。《东方红》的音乐、灯

光、美术，还有我们这部分的舞美……事无巨细，他全都关心，那时候我们都叫总理为总导演。

### 上了一年的编导课

黄卫星：您在《东方红》编导组具体工作是什么？

佟佐尧：刚开始的时候，编导组20多个人，等到后来修改拍摄艺术电影的时候，只剩下十几个人了，有孟兆祥、金明、黄伯寿和我等等，我们一直坚持到第二年10月。修改过程中，一条修改意见出来了，大家晚上都不睡觉，一定要等着指挥部审查后的反馈意见。大家不厌其烦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改，所以这么大的工程，不到十几天初稿就拿出来了。

那时候讲革命冲突。所以有些场是要去掉，有些重点段落要加强。例如遵义会议、苏维埃政权建设、抗日统一战线等等。当时排一段歌颂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，我从《延安的火炬》油画里得到了灵感：一层层的窑洞，到处都是火把。那时候，学生们把棉被拆了，沾上油点火把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。因为我比较熟悉陕北的民间素材，四天就排出来了。不过后来这个场景在审查的时候还是最终删掉了，为什么呢？总理说从历史实际讲，中国人民还来不及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就立刻卷入了内战之中。

黄卫星：这样反复的修改、严格的磨砺，对您的艺术生涯影响特别大吧？

佟佐尧：那个时候，从1964年十·一开始演出一直到过年，停顿一阵子再修改，修改到来年五·一，五·一修改好了再演，一直到十月。1965年的电影跟十·一演出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场序还是一样，党史还是一样的。在修改过程中，党史课是周总理亲自给我们讲的。我刚进《东方红》是协助导演工作的，经过一年的训练和重构，从《东方红》出来后，我就走进

编导行列了。

后来从事编导这个工作，1990年中国第一次办亚运会，我是开幕式的总导演，然后毛泽东100周年诞辰、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的演出，都是我负责的，可以说在《东方红》的这一年，学习了一年的编导课。

###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

黄卫星：您觉得《东方红》艺术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

佟佐尧：尊重艺术规律。《东方红》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非常好、非常成功。对此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：革命现实主义，强调群众的需要就是党的需要；现实主义就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生活，不讲生活，浪漫是浪漫不起来的，是没有根的。但是光讲现实，缺乏浪漫，就没有理想了。《东方红》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，非常有说服力。

有一场里，国民党那些元老们、资本家们，作鸟兽散状，这是一种漫画式的，属于革命的浪漫主义。还有总统府上的旗帜被机关枪打下来的画面，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。历史实际上不是打下来的，但是观众看打下来觉得很痛快，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。当时并没有提出来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句话，后来是学《毛选》时才知道的。实践也证明，凡是这两者结合得好的，都成功了。

黄卫星：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，还体现在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作风上。

佟佐尧：大家不怕苦不怕累，认真踏实，团结紧张。演员都是很令人感动的，到后台看，一人一个小马扎，一人演好几个角色，下场就换，从没人叫苦叫累。

创作人员充满激情和想象，舞美组有很多创新，周总理带着外宾来看《东方红》，那时候我们自己进行技术创新，做了新幻灯。那时候幻灯是高科技了，要把一张照片打到大屏幕上。它实际是一个很薄的水箱，照片搁在镜头前面，照片往下移动，大屏幕照出来就往上走，很有创意但是很难。照片幻灯打出来要变型，上面

宽下面窄，所以从画的时候就要是变形的，那时候几组幻灯，换得工作人员也很辛苦，换景都是很快的。外宾看了觉得很神奇，问“这是怎么弄的”，总理还幽默地说这个保密不能和你讲。

### 试问座下谁泣多？

黄卫星：《东方红》在人民大会堂演出，观众反应如何？

佟佐尧：每天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编导组都坐在观众席里看，看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修改，也观察观众的反应。那时候也不卖票，票发到各个单位都是按各个行业一批批去看的。每次大会堂全部都坐满了，三层都坐满了。主要是北京的观众，也有外地组织过来看的，反响特别热烈。

黄卫星：您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事吗？

佟佐尧：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，边上坐着个小姑娘，在看第四场抗大校歌的时候，她跟着小声哼：“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，人类解放命运全靠我们担承。”小姑娘就问：“妈，你怎么也会唱啊？”她说：“我当时就在那儿上学。”我想：那时候北京好多学生去了延安，她估计就在那批学生里头。她女儿只有十几岁，还带着红领巾。抗大校歌完了，紧接着就是《到敌人后方去》，她就唱出声来了，小姑娘一扭头，问：“妈，你还会唱啊？”她说：“我们就是唱这首歌到敌后去的。”

哎呀，当时我非常感动，这是有共鸣的人，她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。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的音乐完了，队伍慢慢走远了，底下哗哗的掌声一片。我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，她没鼓掌。我想，这很正常，当年她打着背包到敌人后方去，不像舞台上那么壮阔那么浩浩荡荡，都是偷偷摸摸地扒铁路去的。从奔赴延安到1964年观看《东方红》，那段历史引起了她的情感共鸣，没有鼓掌可能是仍然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中，也可能是畅想未来。

### 久唱不衰的经典

黄卫星：《东方红》的创作有很多

创新，您觉得哪些做得比较好？

佟佐尧：《东方红》里的歌曲都特别好，有的是历史歌曲，比如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歌唱祖国》、《保卫黄河》，还有的是新创作的，比如《十月的风》、《带镣长街行》、《就义歌》等等。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歌曲，大多数都流传下来了。独唱歌曲演唱形式多样，比如胡松华在戏里以一个歌者的名义唱蒙古族民歌《赞歌》，大生产那场，《南泥湾》、《边区十唱》等作品演唱的不是歌者，是剧里的八路军战士和延安老百姓。这些歌曲为什么感动人呢？演员们完全角色化了，不像现在一些歌星就在舞台前面演唱自己。

黄卫星：后来也有一些大型歌舞创作，但是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？

佟佐尧：后来又有《中国革命之歌》，那时候从创作、演员到导演，应该说都比《东方红》提高了，但为什么没有广为传播？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创作路径，比不上《东方红》有历史感，但是《东方红》的舞蹈也有很多创新的东西，比如像戏剧一样采用互动的形式，有情节有形象。

黄卫星：现在提起《东方红》，您这一辈的艺术家们，印象还深刻吗？

佟佐尧：我们这一辈老人好久不见了，一通电话聊起来都很熟悉。我自己也思考《东方红》到底成功在什么地方，为什么那么多新创的歌曲，大家当时一听都以为是历史歌曲呢？我觉得是因为整个创作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思想状况，所以一下子就被人们接受了。现在的少先队队歌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这是经过改动的，《东方红》以后，大家都唱，唱的多，这首歌后来成了少先队队歌了。而以前的队歌是“我们新中国的儿童……”这是一个小例子。

### 风雨苍黄

黄卫星：但很快不久，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江青列出禁演的毒草电影名单里虽然没有《东方红》，但是列出

一个可以上演的名单里也没有《东方红》，《东方红》处在中间的“灰色”地带，紧张的政治环境中，《东方红》也被“封存”没有放映。

佟佐尧：有人说那时候《东方红》是禁演的，我没有听到，也没看到文件。当时歌舞团业务已经停止了，但是团里派出各个小分队，到各村各街道去演出，唱的歌许多都是《东方红》里的歌。我所在的那个小队，就是用《东方红》里的歌曲和舞蹈出去演出的。表演《农奴翻身把歌唱》、《大渡河》和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，也包括我之前排的戏《毛主席到安源》，群众都是很喜欢的。

那时虽以样板戏居多，但我们歌舞团都是走上街头，走进部队去表演。那个时候，游行队伍在哪儿集合，我们就在哪儿搭个台演出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演出任务，一般都是演出宣传。

黄卫星：今天年轻人大多知道《东方红》里的一些歌曲，但是对《东方红》不太了解。他们在网络上下载视频看后，感触也很深，虽然《东方红》过了很多年，但是里面的革命激情、理想主义依然很感人。当然现在孩子都有反叛精神，也有极少部分质疑《东方红》搞个人崇拜，对于毛主席完美、高大的形象不以为然。对这种现象，您怎么看？

佟佐尧：毛主席的形象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有意塑造的，而是那个时代共同建构的，老百姓歌里唱的就是毛主席，表达了群众的心声。例如歌曲《东方红》，就是陕北的一个民歌，是由老百姓自己传唱出来的，这不是国家要统一口径，非要赞扬毛主席。

我曾经排了个节目，叫《枣园来了秧歌队》，原来表现的是秧歌队一会到枣园了，一会到王家沟了，见主席见老总。我将《枣园来了秧歌队》改成七大那场了，五大领袖都在秧歌队里与民同乐，结果演出效果非常好。虽然艺术作品有创造的成分，但又着深厚的现实土壤。

我觉得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有历史根源，不可否定那时有吹喇叭抬轿子的人，这些人把毛泽东抬到那个位置上，也有他

们自身的目的。实事求是地讲，这个问题确实存在，当时也是年轻人对毛主席崇拜的狂热推动了“十年浩劫”，毛主席在历史上确实也犯过一些错误。但是中国没有孙中山，推不倒封建王朝；没有毛泽东推不倒三座大山，也建立不了新中国；没有邓小平，我们也富裕不起来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。

#### ■ 文艺界“走、转、改”

黄卫星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，现在中央高层也把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，您觉得《东方红》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意义是什么？

佟佐尧：现在提《东方红》，有两个意义：一是怀旧，一是肯定历史。前些年一些文艺团体也有用合唱和乐队演出《东方红》的，只有歌曲没有舞蹈，反响不是很大。但是去看的老人，他们很感动，很怀旧。

我很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，我真没想到会把文化的地位提得这么高。国家现在讲的是大文化，当年邓小平提出来的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其实现在已经忘了一条腿了，中国走到这步了，应该全力重视建设精神文化了，这次提出发展文化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。

黄卫星：您觉得现在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和症结在哪里？

佟佐尧：《东方红》创作完全符合、适应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、追求和情趣，和实际历史、生活现实契合度很高，所以很快被人们认可了。现在所谓的“舞蹈史诗”，一味追求视觉效果、场面华丽，我虽然不反对这些，但是

始终觉得远远不够。现在的编导，不深入生活，不接近群众，不走到基层，所以就创作不了动人的作品。

现在新闻界、文艺界、社科学术界都在提“走转改”，我觉得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，“走、转、改”是基石，不是提高。现在才提出来是因为之前三十年来没延续好传统。《焦裕禄》那篇文章就是这么出来的，雷锋的报道也是这么出来的，不是说为了遵照“走转改”，才发现的焦裕禄，而是不论是新闻还是文艺创作就应该走到基层去亲身观察和感受，才能创作出真情实感的作品。

黄卫星：那您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有什么好建议？

佟佐尧：我一直工作到70岁。2005年退休之前，文联派我带着队伍去延安，后来又带着队伍去南非，但是到了2005年退休之后，就含饴弄孙，享受晚年幸福时光。

那天我看湖南卫视的一个节目，一个老年妇女说：“我们不能把二人转当作我们的文化传统，还要为二人转搞那么豪华的礼堂，这并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和全部。”我觉得她说得很好，代表了我的心声。文化创作要有传统、有内容。”



佟佐尧近照 摄影/杨荣荣